

六朝时期江南低地平原的开发

王勇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六朝经济的繁荣与江南低地开发密切相关。修建塘浦是六朝江南低地排水造田的主要工程措施。与此同时,利用陂塘控制上游来水,筑造海堤、湖堤、围湖造田等,对促进江南低地开发也有重要意义。在六朝江南的低地开发中,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大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当时的低地开发也极大地改善了江南的生存环境。

关键词:六朝;江南;低地开发;塘浦;海堤;湖堤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1-0214-06

江南的低洼平原区地势平坦、河湖密布,特别适合于水稻种植。然而在历史早期,人类改造水土的能力有限,这里浅滩、沼泽密布,对生产而言又是条件恶劣的地区。《尚书·禹贡》论及天下土壤性状时,称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在九州中位列最末。辛树帜先生解释说,所谓“涂泥”即湿土,之所以列为最瘠,“或以当时灌溉与排水尚不发达,不能利用之故,以致视为无用。”^[1]发展低地平原农业,防洪排涝非常重要。春秋末年吴、越两国开始将农业生产的重心从宁镇丘陵、稽北丘陵转向江南平原地带。根据《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地方史料记载,为了实现“降丘宅土”,当时两国在这里兴建了富中大塘、炼塘、吴堤等水利工程。六朝是江南开发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当时南方最富庶的三吴地区大体都属于江南的低地平原地带。可以说,六朝经济的繁荣,与江南低地排水造田工程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开塘排水与江南低地开发

低地开发在北方早期农业的发展中曾经非常重要。《孟子·滕文公下》载: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2]

大禹治水的主要作为是疏导积水、排除渍涝,而商周时期农田沟洫系统的目的是把田野中的积水排泄到川泽中去,这是当时开发河流两岸平野的基本措施。

通过开辟河渠,使自然地形上的浅水汇集流向深处积水,促使低湿地区逐渐干涸,最后营造成带有排水系统的农田。成田与成河一体化。《越绝书·吴地传》记载:

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渚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泻西野。^{[3](33)}又载:

无锡西龙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吴所造也,属无锡县,以奏吴北野胥主嚳。^{[3](33)}

嚳田是采用刀耕火种技术种植水稻的农田,陵道是陆行大道,但在江南地区也是挖土筑堤同时开成的河港。

《越绝书·吴地传》记载:

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3](36)}

这里水陆兼通的“陵水道”正是春申君所造“陵道”的延伸。《七国考·楚食货》引《一统志》:

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4]

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江南低地的农田往往与河港有关,正是通过开渠凿河将积水排往天然江湖或者利用洼地改造成的人工蓄水陂塘,从而使得大片浅滩沼泽得以开发为农田。

《三国志·吴书·濮阳兴传》载永安三年(260年):

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诏百官会议,咸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5]

收稿日期: 2015-03-22; 修回日期: 2015-05-25

基金项目: 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晋南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15BZS040)

作者简介: 王勇(1975-),男,湖南武冈人,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史,秦汉史

这段材料是六朝江南低地开发中通过开渠凿河排水来实现农田开发的最好证明。塘的原意是筑堤挡水,《永乐大典·卷2276·塘》引《吴兴志》原注“凡名塘,皆以水左右通陆路也”,《练湖志·卷8·题请修复练湖碑记》有“以众水所聚名以为湖,以其筑埂蓄水名之塘”。早期的塘与湖不同,大概是在潮沟上挖出河泥叠筑在两岸,利用两岸之间的河渠进行排水、蓄水的工程,兼有挡洪和交通的功能。修塘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使水面变窄的过程,先有河道在水中的形成,后有农田在两边的分出。^[6]浦里塘就是这种为适应耕垦需要而疏导的河港,故而又名蒲塘港。《读史方輿纪要·卷20·江宁府溧水县》载:

蒲塘港在县南二十里……一名蒲里塘。三国永安三年丹阳都尉严密建议丹阳湖作浦里塘,久之不成,即此。^{[7](985)}

挖泥筑岸在季节性干涸的浅水区相对简单,但在常年积水的深水区则难度较高,不仅对塘浦的深度有更高要求,而且水中捞泥也需要专门的技术。^⑤孙吴筑浦里塘时百官反对,“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却没能成功,应该与当时在深水区筑塘的技术尚未成熟有关。《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建衡元年(269年)奚熙又“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丞相陆凯力谏止之。

在江南低地开发中开塘与成田是相互协同的过程,农田开垦必须与开挖塘浦、排泄积涝同时并进。六朝时期以塘为名的水利工程分布于江南全区域内,由于塘、湖都有蓄水的功能,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已经不甚明确。但在江南低地地区,无论开塘,还是凿湖,主要目的应该都是泄水造田,而且筑湖一般也会配合以输水的沟渠。吴兴郡乌程县的荻塘是六朝时期在太湖东南缘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嘉泰吴兴志·卷19·塘》注引《吴兴记》:

晋太守殷康开,旁溉田一千顷。后太守沈嘉重开之,更名吴兴塘、南塘。李安人又开一泾,泄于太湖。^{[8](4855)}

《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湖州乌程县》记载:

吴兴塘,太守沈攸之所建,灌田二千余顷。^{[9](605)}这些记载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荻塘是用于蓄水灌溉的陂湖,实际上它却是以泄水为主的塘浦。《嘉泰吴兴志·卷19》对荻塘有更详细的记载:

(荻塘)连袤东北,出迎春门外百余里。今在城者谓之横塘,城外谓之官塘。晋太守殷康所筑,围田千余顷^{[8](4856)}。作者特意指出:

濒湖之地,形势卑下,若水不苦旱,初无灌溉意。

史者以为开塘灌田,盖以他处例观,易开为筑,易灌为围。^{[8](4855-4856)}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222》记载,荻塘引余不溪、苕溪之水,自乌程县东“合流而东过旧馆,至南浔镇,入江南界。又东经震泽、平望二镇,与嘉兴之运河合”。^[10]荻塘长百余里,“围千余顷”指通过筑塘泄水而得以开垦的农田。当然,由于堤岸较高,通过闸坝体系加以控制,必要时也能引流灌溉高地,说“溉田一千顷”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嘉泰吴兴志》中“又开一泾,泄于太湖”,事实上也说明了荻塘的工程类型。

荻塘所在的吴兴郡是江南地势最低洼的地区,排水始终是个大问题。荻塘兴修之前,这里就已经开凿有孙吴时期的青塘、柳塘、孙塘,东晋时期的漕渎、官渎等河渠。南朝时期更两次提出在吴兴开大渎排水入海的计划。第一次在刘宋元嘉年间。《宋书·二凶传》记载当时始兴王刘浚提出“吴兴郡,衿带重山,地多污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或方春辍耕,或开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无方”,依据州民建议,提议“从武康瑯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计划从今德清苕溪向东开河,接通谷水,经三泖循东江古道排水出海。^{[11](2435)}另一次在梁中大通二年(530年)。《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当时“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有人建议“当漕大渎,以泻浙江”,政府计划发吴、吴兴、义兴三郡兵丁“开漕沟渠,导泻震泽”,因昭明太子萧统反对而作罢。^[12]南朝政府两次开河排洪的计划虽然都没有实现,但反映出在当时江南低地的开发过程中,洪涝的出路问题始终受到特别的关注。除了专门的塘浦外,运河的开凿以及使自然河道保持比较通畅的局面,事实上也能起到有助排水的效果,从而促进农田开发。《南史·宋本纪·文帝》载刘宋元嘉二十二年“浚淮,起湖熟废田千余顷”^[13]。这里的“淮”指秦淮河,通过疏浚秦淮河,积水得到排泄,千余顷废田得以重新开垦。

江南低地的塘浦河网系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人口与农田少的时候,塘浦的延伸不长;随着人口与农田的增加,塘浦则进一步延伸。这个过程不是一般小农户所能力及的,最初只有国家组织的屯田才有能力进行统一的布置。《文选·卷5·左思·吴都赋》描绘了孙吴军屯的情形:

屯营栉比,解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14]

这里提到了横塘,提到了屯营公所棋布,反映了当时的屯田区是沿塘浦做有序分布的。随着塘浦的延伸,南朝时期江南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塘浦农田的网络化格局。梁大同六年(540年)改晋海虞县为常熟,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说明其改名原因:

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早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15]

《南齐书·王敬则传》记载“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土庶皆保塘役”。“塘役”的存在,反映了当时会稽郡塘浦非常发达,保持塘浦的疏通与每位民众的生产生活均息息相关。王敬则任会稽太守时,“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竟陵王萧子良坚决反对,认为这样会使“塘路崩荒,湖源泄散,害民损政”。^{[16](482)}

二、江南低地开发中的其它水利工程类型

开渠凿河排水是江南低地开发工程建设的主要方面,六朝江南兴建的其它类型水利工程,对促进低地开发同样有重要意义。

调蓄山地径流,控制上游来水,能够减轻平原洼地的洪涝威胁。鉴湖是六朝以前江南最重要的拦洪蓄水工程,其建成便极大地促进了绍兴平原的开发。古代的绍兴平原处于会稽山北麓的冲积地带,发源于会稽山的溪流纵贯平原注入海洋,其中较大的河流东边有曹娥江,西边有浦阳江,中部有若耶溪、兰亭溪等。在没有改造前,这些溪流在山麓及平原地带形成了众多的池沼。由于西南部山丘地势高耸,发源于山上的河流一般都具有源短流急的特征,加上北部地势低洼,时有海水倒灌之患。每当山洪暴发,或特大潮汛,洪流横溢,平原地区往往一片汪洋。为了开发绍兴平原,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了鉴湖。鉴湖被郦道元称为长湖,《水经注·浙江水》载:

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17](941)}

鉴湖的主体工程就是在会稽山麓诸小湖北部修建的长堤,从而围成一个周长310里的狭长大湖,以其巨大库容对会稽山的溪流来水起到拦蓄和调节作用。鉴湖的修建彻底改变了绍兴平原的水环境,给当地的农田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18]《通典·州郡典·会稽郡》载:

(鉴湖)筑塘蓄水,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浙以

无凶年。其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灌田九千余顷^[19]。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兴修的拦洪蓄水工程很多。学者研究指出,六朝“用以拦蓄山地溪流的灌溉设施”,“集中于当时的山地同平野交接的地区,亦即冲积扇地带”。^[20]这些散布于丘陵山麓的大小陂塘不仅为溪流下游的低地平原开发储备了大量灌溉用水,而且基本解除了山陵诸河对于平原低地的洪水威胁。著名的赤山塘又名赤山湖,位于今江苏句容茅山丘陵与秦淮河流域的交界带,这里三面皆岗地,西北一面地势平坦。建湖之前,春夏暴雨时山水汇注,洪潦弥漫;天干久旱则溪流涓涓,水源匮乏。为了解除这种旱潦交织的矛盾,孙吴赤乌初年利用这里环山抱洼的有利地形,修筑长堤,拦蓄东南诸山溪来水,下通秦淮河。赤山湖建成后,湖下大片农田得以开垦。湖熟位于赤山湖下游,距离赤山湖只有八九里。孙吴曾设湖熟典农都尉屯田;《晋书·毛宝传》载苏峻之乱时,毛宝“烧峻句容、湖孰积聚,峻颇乏食”^{[21](2123)},说明这里已经成为重要产粮区。练湖位于今江苏丹阳宁镇丘陵与太湖冲积平原的交界地带,这里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建湖之前,春夏多雨季节,西、北二面的山水浩浩荡荡,奔腾直泻,极易造成平原地区洪水泛滥。西晋末年陈敏据有江东时修建练湖,目的就是为了把洪水蓄积起来加以利用。《读史方輿纪要·卷25》引《南徐记》:

湖周百二十里,纳丹徒长山、高骊诸山之水,凡七十一流,汇而为湖。^{[7](1261)}

练湖利用有利地形,对西北长山、高骊山的来水进行拦蓄调节,建成周长40里,蓄水面积两万余亩的大湖。练湖的建成,使湖下地区免受山洪侵袭,为当地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江南东部边界大部分为海岸与河口段,而且其海岸带的海拔高度高于中心区的平原,一旦发生潮灾,咸水内灌,势必祸害低地。六朝以前江南已经开始修筑零星海塘,防御海潮。《水经注·浙江水》引《钱唐记》:

(钱塘江)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东汉)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17](939)}

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海塘建筑的最早记录。六朝时期,江南的海塘工程更为系统。至元《嘉禾志·卷12·宫观》记载吴主孙皓时,“华亭谷极东南,有金山咸塘,风激重潮,海水为患。”万历《嘉兴府志·卷8·海塘》引《赵图记》称:

海塘去郡城百里遥,巨海盐、平湖二县之境,延袤百七十里。

汉晋时华亭的海岸在金山至王盘山一线,由于海岸受

冲内蚀，唐朝以后金山、王盘山方成为海中孤岛。三国时金山一带兴建捍海堤塘，很可能与孙吴屯田海昌，适应在海宁、平湖一带从事垦殖的需要有关。《晋书·虞潭传》记载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吴兴太守虞潭在松江海口“修沪渎垒”，《晋书·孙恩传》记载安帝隆安四年(400年)“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沪渎垒”，对之进一步修复。沪渎垒最初或为海防工事，但因为具有防潮的作用，被后世视为江苏“海塘肇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0》引《嘉定县志》云“沪渎垒筑于沿海一带，以遏潮冲”^[22]；光绪《宝山县志》说“沪渎垒即捍海塘，在吴淞江老鹤嘴，亘南北八十余里”。此外，《新唐书·地理志》载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23](1059)}；会稽“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畜水溉田，开元十年令李俊之增修”^{[23](1059)}。文中明言“重筑”“增修”，可见这些长距离的海塘工程在开元以前就已存在，而且很可能筑于东晋南朝。前引《南齐书·王敬则传》“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土庶皆保塘役”，这里的“塘”估计也包括海塘。

与海塘功能相似的有湖堤，在江南地区主要是防御太湖汛期泛滥，淹没湖周围特别是东南方向的低地。在太湖周围开挖的塘浦，由于同时会用挖出的泥土在河渠两岸筑堤，事实上都有分割太湖与湖周围水乡的作用。孙吴时修筑的青塘，乾隆《湖州府志》引元人程郁新《新复青塘堤岸记》记其系自吴兴城北迎禧门外西抵长兴“为长堤数十里”，“以绝水势之奔溃，以卫沿堤之良田，以通往来之行旅”。这说明青塘起到了太湖障水堤岸的作用，它的建成对于控制太湖洪水泛滥，改善太湖南边水乡沮洳下湿的状况，促进当地垦殖有很大帮助。东晋开始开凿的荻塘，西起吴兴城，东抵平望镇，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其塘岸实际上成了太湖东南缘的一条大堤，能够起到阻遏太湖风涛泛滥的作用，促进今湖州地区的开发。

六朝时期江南低地开发已经开始向深水进军。前面提到孙吴时“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但未能成功。康熙《常州府志》引《南徐记》，晋元帝时晋陵内史张闳曾经在无锡武进间的芙蓉湖“堰其中，泄湖水”，做围湖为田的尝试。从工程措施看，与孙吴建丹阳湖田不同，张闳应该是试图在湖中筑堤后将水排干，开拓农田。由于施工时天寒地冻，这次尝试也没有成功。垦湖为田最早的成功记录出现在南朝刘宋时期。《宋书·孔灵符传》记载孔灵符任丹阳尹，“山阴县土壤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费之家于余姚、鄞、郟三县界，垦起湖田”，虽然朝廷多数官员

反对，但“上违议，从其徙民，并成良业”。^{[11](1533)}进行垦拓的余姚、鄞、郟三县位于会稽郡最东部的沿海地区，这里“垦起湖田”大概是将湖水排干后开拓成田。《宋书·谢灵运传》记载“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可见当时确实存在将湖水排干后开拓农田的方法。决湖的结果自然是湖中水产的消失，对附近百姓的渔采造成影响。所以当时会稽太守孟顛才会以“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坚决反对；而谢灵运也认为孟顛“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11](1776)}。

三、士族在江南低地开发中的作用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研究宋代江南经济史时，参考对泰国湄南河流域开发过程的研究，将江南从地形上分为三个部分，并且认为江南的开发遵循以下顺序：河谷扇形平地—三角洲上部—三角洲下部。为了论证其观点，斯波义信提到了六朝的情况，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广大的低湿泛滥平原“仍是人口较少的荒芜地域”，“绝非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当时的江南“是以分散在各地的互不相连的高阜地上的资源为支柱的”，政府对低地的关心，主要只表现在对水运系统的改善和沿海地区盐碱地的开发方面。^{[24](194)}。由于研究重点是宋代江南经济，斯波义信对这一观点没有具体论证。然而，前述六朝江南水利工程，就类型特征而言，无疑是促进低地农业发展的基本措施，而且以低地为主的三吴地区在六朝也是公认的富庶之地。《晋书·诸葛恢传》载晋元帝任诸葛恢为会稽太守时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21](2042)}；《晋书·文苑传》载伏滔说“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21](2400)}；《南齐书·王敬则传》载萧子良说“三吴内地，国之关辅，百度所资”^{[16](482)}；《宋书·卷66》传论也说“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郟、杜之间不能比也”^{[11](1739)}。相反，建康周围宁镇丘陵上的丹阳、晋陵等地却没有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说：“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秽恶。”^{[5](592)}《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任丹阳尹时提出，丹阳“民贫业废，地利久荒”^{[16](694)}。

斯波义信承认下游三角洲地区“特别适于发展水稻生产”，并且生产潜力很大。之所以开发较晚，他认为这里是这里的“围垦排水造田工程，要经过周密的计划，运用水利工程学与组织营运等广泛知识及大量的资本投入才能得以实现”^{[24](179)}。然而，这一基于泰国湄南

河流域开发得出的结论,却并不见得适合于江南地区。首先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技术无疑远较泰国先进,而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东汉以来江南豪族势力的发展。诚然,因为人口压力等原因,江南低地深水区的深度开发主要在宋代以后,但总体而言,六朝时期江南开发的重点应该是斯波氏所说的“适于农业”的低地地区,而不是“适于居住”的地势较高的丘陵地带。葛洪《抱朴子·吴失》称孙吴末年江东大族“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25],这些大族的代表主要就是位于低地地区的吴郡朱、张、陆、顾,会稽虞、孔、魏、贺,以及阳羨周氏、吴兴沈氏等。东晋建国后,江东大族的势力完全得到保留,又有很多北方大族定居三吴。这些大族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出面组织兴修水利,在六朝江南的低地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嘉泰吴兴志·卷5》记载:

青塘在县北三里迎禧门外,吴时开。梁太守柳惔重浚,亦名柳塘。^{[8](4712)}

同书卷19记载:

谢塘在乌程县西十里,晋太守谢安开塘。^{[8](4856)}

官塘在长兴县南七十里,晋太守谢安所筑,一名谢公塘。^{[8](4856)}

在中村圭尔整理的六朝“三吴地区水利设施表”中,诸如柳塘、谢塘,这种以姓氏取名的工程不少^[20],直接反映了大族首领在这些工程修建中所起的作用。其它地方水利工程亦同样如此。例如前面提到荻塘,《嘉泰吴兴志》记载为“晋太守殷康开……后太守沈嘉重开之,更名吴兴塘”,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吴兴塘,太守沈攸之所建”。荻塘与吴兴塘大概属于同一个工程,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工程的兴建者中有两位都是姓沈。沈嘉、沈攸之都是当时吴兴郡最大的强宗——吴兴沈氏的成员。两晋以后,吴兴沈氏是可以同吴郡四姓并列的豪门大族。因此,荻塘、吴兴塘其实是沈氏成员以本地太守的身份,在家乡附近兴办水利事业。《嘉泰吴兴志·卷19》在对“荻塘”的记载中还有“隋沈弘居此”^{[8](4856)},可见荻塘附近在整个六朝都是沈氏家族成员的主要聚居地。此外,《宋书·恩幸传》记载,阮佃夫“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于宅内开浚,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11](2314)}。这种没有名字的规模不一的水利工程,在当时遍布江南的大族田庄内部以及周围必然非常普遍。

湖沼周围土地肥沃,在六朝时期是重点开发的地区,存在大片良田。《宋书·卷66》传论称当时的会稽郡,“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

一金”。而在当时湖沼的开发中,亦往往有大族的身影。《水经注·浙江水》记载:

浦阳江自嵎山东北径太康湖,车骑将军谢玄田居所在。^{[17](946)}

太康湖位于浦阳江(曹娥江)下游的始宁县近郊,是谢氏南渡后选择的安身立命之地。正是经过谢氏几代的努力经营,在湖沼周围进行了很多水土改造,这里展现出了一幅美丽的田园景象。谢灵运是谢玄之孙,《宋书·谢灵运传》记其“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11](1775)}。他自己在赋中描述谢氏在始宁的庄园: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

近东则上田、下湖,西溪、南谷;

近北则二巫结湖,两辘通沼。横石判尽,休周分表。引修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漾;

阡陌纵横,塍埒交经。导渠引流,脉散沟并;

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浚潭洞而窈窕,除菰洲之纤余。^{[11](1757-1760)}

谢灵运是六朝时期热衷于开发湖沼的突出代表,前面提到他请求决回踵湖为田,遭到会稽太守孟顛决绝。而在那之后,他又曾“求始宁岷嶂湖为田”,结果还是被孟顛决绝,两人甚至因此结怨。谢灵运还有一首“白石岩下径行田”,是他任永嘉太守检查农田时所作,其中写到“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州流涓涓合,连续塍埒并”^[26]。从诗文的描述看,这里应该就是他修筑塘河,排泄平地积水,开发低地农田的规划。

六朝是中国古代庄园经济最为稳定和繁荣的时期,当时的豪门大族既有实力也有热情组织水土建设,经营自己的田庄,很多水利工程都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士族的个人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肥沃的低洼沼泽之地被大量改造成了良田,而且整个江南地区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明显改观。汉晋时期,对于南方地理条件的评价,“卑湿”一词用的频率极高。《史记》《汉书》一再提及“江南卑湿”“南方卑湿”。人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相对容易患病。当时北人对南方生活环境心存畏惧,普遍都不愿前往南方,政府甚至将迁离南方作为一种嘉奖。《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

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衡山王王济北。所以褒之。^[27]

当时封邑在南方的贵族也情愿减少封邑,只为能够迁回北方。《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春陵侯刘仁“以春陵地执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

徙”^[28]。然后，六朝以后这种对南方的畏惧心理就基本消失了，这应该有随着南方低地开发的发展，卑湿状况得到明显改观的原因。

唐代中后期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学界关于唐宋以后江南开发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然而，唐代江南经济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六朝江南经济发展的继续。尽管由于史料缺乏，即便是农田数量，六朝江南也没有留下确切数据，但通过对与其关联的水利工程设施的详尽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六朝江南开发的基本面貌，及其着重于低地排水造田的区域特征，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江南开发的历史进程是有益的。

注释：

- ① 《梦溪笔谈》记载了宋代修建至和塘的过程。“至和塘，自昆山达于娄门，凡七十里，自古皆积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抵郡城，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蓬蓆(粗竹席)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蓬蓆中，候干，则以水车畎去两墙间旧水，墙间六丈，皆留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

参考文献：

- [1] 辛树帜. 禹贡新解[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0: 128-132.
 [2]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447-448.
 [3] 李步嘉. 越绝书校释[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4] 董说. 七国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96.
 [5]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451.
 [6] 王建革. 唐末江南农田景观的形成[J]. 史林, 2010(4): 58-69.
 [7]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8] 谈钥. 嘉泰吴兴志[M]. 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9]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0] 穆彰阿, 潘锡恩. 大清一统志[M]. 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二十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11]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2]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168.
 [13]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9.
 [14] 萧统编, 李善注.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17.
 [15] 郑钟祥等. 光绪常昭合志稿[C]// 江苏古籍出版社选编.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二十二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16]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7] 陈桥驿. 水经注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8] 陈桥驿. 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J]. 地理学报, 1962(3): 187-201.
 [19] 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966.
 [20] 中村圭尔. 关于六朝时期三吴地区水利和农业开发的若干考察[C]//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 农史研究·第7辑.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8: 70-82.
 [21]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2]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M]. 四部丛刊三编子部·第二十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23]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4] 斯波义信.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25] 杨明照. 抱朴子外篇校笺·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45.
 [26]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168.
 [2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3081-3082.
 [2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560.

On the lowland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region in the Six Dynasties

WANG Yo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he Six Dynas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wland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region. Construction of Tang-pu is the main engineering measure for draining away water and creating farmland at the lowland of Jiangnan in the Six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of essential importance to control upstream with pond, to build sea banks and lake banks, and to reclaim land from the lak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lowland development. Those semi-famous clans with strong economic strengt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wland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in the Six Dynasties, while the lowland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also great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 in Jiangnan region.

Key Words: the Six Dynasties; Jiangnan region; lowland development; Tang-pu; sea bank; lake bank

[编辑: 颜关明]